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栽植奇花和乔木

—— 未名社作品选

主编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 主编

栽植奇花和乔木

——未名社作品选

汤逸中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栽植奇花和乔木——未名社作品选/汤逸中选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钱谷融主编)

ISBN 7 - 5617 - 2345 - 8

I. 栽… II. 汤…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922 号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栽植奇花和乔木

——未名社作品选

主 编 钱谷融

选 编 汤逸中

责任编辑 夏 玮

特约编辑 周远斌

责任校对 邱红穗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 - 62571961

传真 021 - 62860410

<http://www.hds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

850 × 1168 32 开

印张 9.5 千字 238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7 - 5617 - 2345 - 8/1·235

定 价 1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前 言

未名社是鲁迅于 1925 年 8 月发起组织的新文学社团。此前,鲁迅正在编一种专收翻译的丛书《未名丛刊》,由北新书局出版,已印行他自己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等几种。韦素园、李霁野等也有志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都有译稿给鲁迅。但因书店一般不肯印青年人的译作,鲁迅就建议和他们一起自己办出版社,自己印《未名丛刊》,只印自己的译作,不收外稿,书稿由鲁迅审阅、编辑。鲁迅和北新书局李小峰商量征得同意后,《未名丛刊》就此从北新书局移出,“另立门户”,因丛书名“未名”,社名也就叫“未名”。鲁迅说:“未名”并非是“没有名目”,而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①在 1925 年 8 月的《鲁迅日记》中,有“韦素园、李霁野来”,“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来”的记载,商谈的主要就是组织未名社事。曹靖华知成立未名社,亦加入。办社经费,韦素园等 5 人每人 50 元;主要是由鲁迅承担,出资 466 元多。这就是未名社的成立缘由。未名社成员 6 名: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除鲁迅外,都是青年;李霁野、韦丛芜当时刚从北京崇实中学毕业;台静农在汉口读中学未终业,当时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旁听;韦素园、曹靖华在苏俄留学一个短时期回国,打算继续学习俄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文。未名社是鲁迅为培育、帮助文学青年，主要是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而成立的。

因此，未名社的主要活动，是在译述外国文学方面。鲁迅说未名社韦素园等“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①他们侧重于翻译俄罗斯苏联文学。由未名社印行的《未名丛刊》，计有鲁迅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日厨川白村著）、《小约翰》（荷兰望·蔼覃著），韦素园译的《外套》（俄果戈理著）、《黄花集》（俄屠格涅夫、科罗连柯、高尔基等的短篇小说集），李霁野译的《望星中》、《黑假面人》（俄安特列夫著）、《不幸的一群》（俄陀斯妥也夫斯基著），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文学与革命》（俄托洛斯基著），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俄陀斯妥也夫斯基著）、《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著），曹靖华译的《白茶》（苏联独幕剧集）、《蠢货》（俄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的独幕剧集）、《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等。《莽原》、《未名》半月刊上也多有未名社同人及其他人的译作。这些，在当时的文学翻译界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文学革命后涌现的许多新文学社团，一般都是以创作为主，兼翻译，唯独未名社是以翻译为主，兼创作。这是未名社的特色。吸取异域养料以滋补自己，对中国新文学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二十年代的新文学初创时期。这是未名社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贡献。李霁野、曹靖华、韦丛芜在未名社结束后，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并有更大的发展，成为现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这是未名社培育文学新人的业绩。

未名社在创作上也取得相当的成就。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先是在《语丝》、《莽原》周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1926年末名社出版《莽原》半月刊后（1928年改名《未名》半月刊），他们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的创作就多了起来。未名社出版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印行了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李霁野的小说、散文集《影》，韦丛芜的诗集《君山》、《冰块》等。这在当时的文坛也是不小的收获。

台静农本无意于小说创作。他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①但是，由于高长虹等从《莽原》分裂出去，为了韦素园的鼓励，为了支撑刊物，他终于一发而不可收，1927年的《莽原》半月刊几乎每月都有他的一篇小说，用他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了人间一个个酸辛和凄楚的故事。他取材于民间，深深同情于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贫苦农民和贫民阶层，倾诉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描写他们的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刻划他们朴质、善良而又愚昧的性格，而把憎恶投向凶恶霸狠的豪绅和官吏。作品生活气息极浓，富有地方色彩，乡间的风俗陋习及社会世相，得到真实有力的表现。尤善于用白描手法，活泼泼地写出各种人物来，人物语言是个性化的。结构精致，多截取生活横断面，重剪裁，去枝蔓，作品篇幅短小而容量丰厚，体现了作者对短篇小说特点的把握和驾驭语言的功力。《天二哥》、《拜堂》等篇尤能代表他的创作的特色和成就。鲁迅评论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②他后来把这些小说结集为《地之子》。可以说，《地之子》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以后还有小说集《建塔者》，其中多写革命者的故事和监狱生活，反映了国民党清党时期的白色恐怖，这是另一面人间的酸辛和凄楚，但也许是这另一面的生活积累不足的原因吧，在《地之子》中的

①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熟练的白描手法常被主观的抒情和议论代替,艺术上比《地之子》逊色了。

李霁野的小说写了较多的恋爱故事,主要是从恋爱角度探索人性和人生奥秘的。他长于心理刻画,写得曲折细致,深切动人。鲁迅说他“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①但他也有描写变乱时期野心家和士兵的浮沉,谴责军阀战争的作品。他的有些作品,受安特列夫的影响,象征印象气息较浓,如小说《微笑的脸面》等;剧作《夜谈》也还有着安特列夫剧作的那种探究人生意义的哲理特色。

未名社的主持者韦素园,鲁迅评论他:“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数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②他长期患病,英年早逝。他遗留的诗歌散文,多数是卧病期间对于人生、友谊、爱情的感受、思索。他患的在当时来说是不治之症的肺病,正值青春年华,对文学事业抱有远大的计划,却只能一个人长期孤寂地在家中病室卧床疗养,生命的空虚、无常和顽强的生的意志的矛盾自然流露于他的笔端。他重视友谊,对朋友忠诚真挚,这是建立在进步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友谊,如为囚禁于牢狱中的台静农、李霁野写的《忆“黑室”中的友人》,悼念牺牲的革命者的《忆亡友愈》,为共产党员赵赤坪被捕而写的《怀念我的一位亲友》等诗篇,都表现出一颗赤诚的心和乐观主义精神。他有过两次恋爱,散文《端午节的邀请》记录的是第一次爱情的真实故事。第二次爱情,女友赴美留学,1926年底写信来,并有十首定情诗,当时韦素园已患肺病吐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血,乃复信婉劝她另选爱人,可见他对爱情的高尚纯洁。文如其人,他的诗文真诚、朴素、自然,自有一番感人的力量。

未名社的诗人是韦丛芜。《君山》是他的爱情诗篇,笔调清新,多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把初恋的欢欣、思念、等待、希望、焦虑、悲哀,表现得缠绵悱恻,委婉动人。他还写了不少富有现实战斗气息的诗篇,如《绿绿的灼火》、《荒坡上的歌者》等。《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是他参加三·一八事变后写下的真实记录和感受。

未名社成员的创作,以及发表在《莽原》、《未名》半月刊上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多描写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封建陋习造成的悲剧,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权势者的不仁。即使是抒写个人情怀的诗文,也多和社会、人生息息相关。艺术方法则以现实主义为主,如台静农的《地之子》,刘重修的《荒坟》等,多以真实描写为主。有些作品也受到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如《月灾》等。但就未名社及其刊物来说,不是主要倾向。有的文学史著作认为未名社在文艺思想倾向上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这大体上是符合未名社实际的。

这里,想探讨一下未名社和莽原社的关系。首先,正如李霁野所说,认为“莽原社是未名社前身的说法是不正确的”。^①莽原社是鲁迅于1925年4月为培植文艺青年,主要是培育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青年作者而发起成立的,它以编印《莽原》周刊为主要社务;未名社则如上所说,是1925年8月鲁迅为培植文艺青年,主要是培育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者而发起成立的,它以编印《未名丛刊》为主要社务。同为文学社团,各有侧重面。但是,未名社和莽原社又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都是由鲁迅发起成立,以鲁迅为主脑,刊物都由鲁迅编辑。而未名社诸君,除翻译外,也都是能创作的。在《莽原》周刊的撰稿人中,有两支基本力量:一支是高长虹、向培良、

① 李霁野:《记未名社》

尚钺、黄鹏基、高沐鸿等狂飚社成员；另一支则是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未名社成员，他们也为《莽原》周刊贡献了不少的译作、诗歌、散文和小说。《莽原》周刊创刊第一期的作者阵容是颇有意思的，七篇稿件中，鲁迅二篇，高长虹、向培良、李霁野、韦素园、荆有麟各一篇（荆有麟曾是鲁迅的学生，当时参与《莽原》周刊的发起和编务工作）。其时，未名社尚未成立。我以为，鲁迅从一开始，就是把韦、李、台等人看作《莽原》周刊的基本撰稿人和莽原社成员的。因此，在1925年11月《京报》停止发行《莽原》周刊后，《莽原》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莽原》半月刊是《莽原》周刊的继续，仍由鲁迅编辑，它既是未名社的刊物，也是莽原社的刊物，鲁迅并未把《莽原》周刊的结束看作是莽原社的结束。因此，1926年8月鲁迅离京南下，《莽原》半月刊由韦素园接编，因为韦素园是未名社成员，也是莽原社成员，顺理成章。9月，高长虹为向培良稿件事和韦素园发生冲突，高长虹等狂飚社成员从《莽原》分裂出去，鲁迅说：“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狂飚社。”^①自此以后，《莽原》半月刊便由未名社独立支撑，完全成为未名社的刊物，而莽原社也由此而解体了。当时，鲁迅曾考虑把《莽原》半月刊改名为《未名》半月刊，后来又决定不改名，因为“《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②这里的《莽原》指半月刊，也指周刊，它也是鲁迅以及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等的。但是，《莽原》和高长虹究竟是有着历史关系的牵扯，所以，从1928年起，由鲁迅提议把《莽原》半月刊改为《未名》半月刊。这是未名社和莽原社及其刊物的复杂关系。

《莽原》半月刊因高长虹等分裂出去而骤然少了一批撰稿人，稿源较紧张。而未名社的主持者韦素园又不幸于1926年底患病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 《鲁迅书信集·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

后长期休养,社务和刊物由李霁野主持。鲁迅虽然南下,仍以通信等方式对未名社工作加以指导,继续审阅译稿,努力写稿支持刊物。鲁迅的《朝花夕拾》中10篇散文,《奔月》、《铸剑》等历史小说,以及一些杂文、译文都是刊登在由未名社独立支撑的刊物上的。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也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台静农的小说《地之子》、《建塔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一段时间里,未名社的业务办得蒸蒸日上,丛刊印了十几种,期刊按时出版,《莽原》半月刊两年共出48期,还成立了未名社门市部,规模扩大了,这一段时间被称为未名社的黄金时期。

未名社结束于1931年。由在京的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决定,由韦丛芜出面,与开明书店签订合同,将未名社存书销售及社员译着印行事宜托开明书店代理,并函请鲁迅也遵守该店有关规定。鲁迅甚不满,即复信答以同人既不自管,声明退出未名社。未名社解体原因,一是经济,未名社分销处欠款不付,韦丛芜向社里支付过多,使未名社经济困难。但更主要原因,是成员的或病或离,而没有吸收新人。未名社是鲁迅为培育文学新人而成立的,一年多后,未名社的年轻人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可独立工作,鲁迅南下后就交由他们来经营未名社。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办得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培养、吸收新分子。未名社本来就只6人,韦素园病,鲁迅到上海后编《语丝》、《奔流》,与创造社等展开革命文学论战,后又参加和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法北顾未名社。这样,人手就很单薄。因此,《未名》半月刊后来就常因稿件困难而出版不正常了,两年多时间只出了24期,到1930年4月期刊先行结束。1930年9月李霁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做教授,实际上离开了未名社,由韦丛芜主持社务。1931年,韦丛芜也到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做教授去了。未名社解体势所必然。鲁迅对此颇感惋惜。在1931年10月27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未名社开创不易,现在送给别人,实在可惜。那第一大错,是在京的几位,向

来不肯收纳新分子进去,所以自己放手,就无接办之人了。其实,他们几位现在之做教授,就是由未名社而爬上去的,功成身退,当然留不住,不过倘早先预备下几个接手的青年,又何止于此。”这是说中了未名社解体的主要原因的。

关于选编本集的几点说明。本集所收,以未名社成员的创作为主,但也选收一些发表在《莽原》半月刊(指1926年10月以后的,10月以前的已收入莽原社作品选,为免重复本集不再选收)和《未名》半月刊上的其他人的作品,以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但如戴望舒、刘一梦等属于别一集团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因要另出选集,本集未予选收。鲁迅的作品,因《鲁迅全集》较易找到,为节省篇幅,均作存目。本书编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汤逸中

1992.9.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像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

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像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像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于

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像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

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